“不朽”之功如何立？

王西冀

古人称人生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对于各级干部来说，尤其是走上新领导岗位的同志而言，更是想急于立功、快出政绩。这种立功的心理本是值得嘉许的，也是激励干部多干事、干成事的源动力。但要使立功“不朽”，还需弄清楚为谁立功、立什么样的功和怎样立功的问题。

领导干部想立功，无可厚非，但只有立根于百姓，政绩才有不朽的可能。如果只是为自己升迁积累资本，为自己形象积攒人气，这个立功的根基就已“跑偏”。也有一些人说，我干的哪一件事不是为了百姓？但扪心自问，干一件事是真为百姓还是真为自己，不仅决策的出发点不一样，效果也会迥然不同。一些所谓为百姓的事情，到头来百姓不买账，原因就在这里。在这个意义上讲，真是为百姓的政绩，就离不开百姓的全程参与。决策干事前问百姓意愿，干成事后问百姓感受，干得怎么样百姓说了算，这样的功绩才会让群众满意，这样的干部才会让群众念叨。所谓功绩的不朽，从根本上说，是活在人的心里。

我们说人心是杆秤，其实岁月更是一杆无情的秤。有的工程，虽然干事的人早已化为尘土，但仍在泽被苍生。有的项目，虽然干事的人还健在，却早已千疮百孔，不得不推倒重来。一些城市很是豪华气派，但等到一场大雨漫城，才验出它只是表面光鲜。一些所谓民生实事，也曾收一时之效，但到头来民众才发现不过是“雨过地皮湿”。正反两面的事实表明，经得起岁月淘漉的，必是那些实实在在的功绩，一时或不显山露水，但终究能发挥关键作用。那些经不起风雨打量的，必是那些虚头巴脑、花拳绣腿的东西。是身后被人骂，还是身后被人念？生前不能不想好，创造政绩时不能不考量。

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才能出实在的政绩，这个道理很是浅显，各级干部也不是不懂，但一些干部的行为却总是与此相悖。有的“拍脑袋”决策，动辄谋划“大思路”，随意抛出“大手笔”，拼命追求“短平快”，结果留下了“半拉子”工程，留下了群众心寒的“政疾”。有的热衷于跟风赶浪，说话做事看“来头”，看“风头”，或热衷于“新设想”，调子唱得老高，实际问题不触及，或热衷于当“原则领导”，落实没有不过问，结果如何不去管。这些弊病说到底，还是担心老实会吃亏，觉得踏实很寂寞。看到别人投机取巧处处得利，认为自己埋头苦干出一件好事后“黄花菜都凉了”。然而，速生往往速朽，立足于实干，创出了实在的功绩，才是不朽的，自己也才是笑到最后者。

由是观之，只有立根于百姓，立基于实绩，立足于实干，方是立真功。这样的功绩，给人以静气，不戚戚于名利；又给人以底气，行得稳坐得正。我们说干事，修养是首要的导向；我们说修养，干事是最好的磨炼。

（摘自《人民日报》）

干部下乡：身到还需“心”到

骆晓飞

不久前记者在青海一些地方下乡采访时，一些基层干部和群众反映，现在的一些干部工作作风大不比从前，下乡更像是完成任务、走过场，虽然身子下来了，但心思并不在基层，给老百姓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帮不上什么忙。

“就像是酥油漂在冰水上，酥油是酥油，冰水是冰水。”正如一位基层群众形象的比喻，干部下乡，如果仅仅是走形式，那么本该水乳交融的干群关系也就变成了水是水、油是油，二者并没有形成交融，那么“下乡”也就失去了应有之意。

毋庸置疑，记者听到的基层干部群众所反映的情况肯定不是普遍现象，但是就全国范围来讲，相信也绝不是孤例。

干部下乡，其本意是要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民情，掌握民意，急民之所急，想民之所想，如果仅仅是人到了，心却沉不下去，那这样的“下乡”就不仅有劳民、扰民之嫌，而且也对不起自己所领的那份“皇粮”，说得严重一点，这是一种“隐性”渎职。

作为代表党和政府直接与基层群众打交道的下乡干部，做好群众工作是其首要的大事，而要做好群众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要知道老百姓在想什么、需要什么，这就需要深入群众调研，需要花心思琢磨老百姓的事。

只有身到了，心也到了，而且也用心琢磨老百姓的事了，才能替老百姓出谋划策、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才能将党和政府的惠民富民政策落到实处，为党和政府赢得民心。

眼下，随着“年味”日渐趋淡，各行各业又进入了繁忙的时期，尤其在广大农村牧区，备耕和春耕生产已经陆续展开，有必要提醒下乡干部：“人下乡了，心也需要跟着下乡。”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最低消费”滋生浪费

刘　瑾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近日对餐饮业设定包间费和最低消费的现象作出表态，认为包间费和最低消费一般是指餐饮行业提供差异化服务所收取的服务费用，从收费项目看，包间费和最低消费都是针对餐厅包间消费，二者应只收其一。在即将出台的《餐饮业管理办法》中，会对包间费和最低消费作出更明确的规定。

酒店的包间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优质的条件和服务，如独立的就餐空间、讲究的装修、周到的服务等。不过，很多酒店的包间往往设置“最低消费”标准，而且“最低消费”标准还往往不包含酒水费，这无疑增加了消费进入包间的门槛。为达到最低消费标准，消费者只能靠多点菜来实现，而多点的又吃不完，造成浪费。

自光盘行动开展以来，人们普遍感受到餐饮新风带来的变化，聚餐时也都会笑着提醒拒绝“剩”宴。有些酒店设置包间“最低消费”标准，或只供应成套的标准餐，无形中加剧了食物的浪费。

笔者认为，从推动消费的规范性而言，餐饮新规可同意酒店收取包间费，但绝对不能允许包间费之外再设置“最低消费”标准。新规不能只给商家添进账，而应从设定之初就考虑到如何避免浪费的问题，切不能拖了光盘行动的后腿。

（摘自《经济日报》）

“立法鼓励救人”是在给社会道德“压惊”

张军瑜

1月初，《深圳经济特区助人行为保护条例(草案)》公开面向社会征求意见后，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该条例在2月22日已提请初审。用法律来保护道德、挽救道德，终于走到了这一步。(2月25日《羊城晚报》)

在我看来，影响最坏的并不是“反咬一口”的那些人。社会舆论具有自发选择性，这种舆论虽然有时候不免偏激，但是大体上，它追求的总体方向是真善美，摒弃的还是伪恶丑。“以怨报德”的个人行为，终究掀不起什么大的浪花。

造成了更大不良影响的，恰恰是紧随其后的法律判决。有些法律判决，几乎就是在等同于向社会传达着这样一个事实：救人有危险，我辈当谨慎。社会大众可以接受和消化得了个别人的不当行为，但是却难以忍受法律判决所造成的偏颇。在令人错愕的判决面前，一些传统社会美德难免开始寸寸崩塌。当事人三缄其口，事实真相无从追究；从时候来看，司法的正义才引导者人们的观感。

对“见义勇为”不该纠结于“该不该扶”这些日常琐事，而是该解决如何避免见义勇为的公民“流血又流泪”。社会冷漠的原因很多，不能一概归咎于民众道德水准的下降。法律的及时调整，则能够坚守住最后的底线。这种调整，至少是对见义勇为行为的一种“保驾护航”。我们应该把这种“无过错推定”延伸到更多地方，让见义勇为者不再有法律上的后顾之忧或道德遗憾。

当然，这种“无过错推定”很可能有其不足和缺陷。但相比它所带来的正面效应，这样的改变，无疑会赢得大部分人的支持，也是在给被挟持的社会道德“压惊”。

（摘自《武汉晚报》）

阅批群众来信是领导必修课

涂启智

据媒体报道，北京市政府工作规则日前以文件形式向市民公布，其中在推进政务公开、健全监督制度、加强廉政建设等方面，均有非常细致的表述，比如规定市政府领导要亲自阅批群众来信等。

领导完全有必要亲自阅批群众来信。群众来信可谓“无事不登三宝殿”，或者因为权益受到侵害，通过正常途径维权无济于事；或者是因为对某种丑恶现象义愤填膺却无能为力——前者反映的是民生意愿，后者彰显公民意识，二者都是现代社会建设必须小心呵护的。

领导阅批群众来信是体察民生、履行职责的重要渠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各级政府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都在于此。群众来信反映真实的困难疾苦，寄托群众的热切期盼，其中可见民生、民情、民意。领导不可能天天深入基层调研了解实情，阅批群众来信，一定程度上正是对“调研渠道”的拓展。

领导若不“亲自阅批”，群众来信的“遭遇”将如何？单位收发室或者秘书，收到信后一般会置之不理，而看了也白看——工作人员并无权力达成群众诉求。还有一种更糟的可能，就是来信不知在哪个环节被截留，最终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在一个规范成熟的法治社会里，职能部门依法履责，社会公平正义最大化实现，不仅不需要领导阅批推动问题解决，群众来信这样的形式也会式微。但中国尚处于社会转型期，法律制度体系还不完善、法律执行力度不佳、社会整体公民及法治意识比较淡薄，如此现实语境下，领导阅批对于快刀斩乱麻、平息社会矛盾纠纷、推进民生困难解决，仍具有无可替代作用。因此，规定领导要亲自阅批群众来信体现了制度善意，构建了一道约束机制。

规定领导亲自阅批群众来信，并非由于“心血来潮”的偶然冲动，而是与时俱进顺应民意的务实举措。十八大之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切实从各方面大力改进作风，赢得舆论、民众一致好评。从中央高层到地方各级党政官员，劲吹节俭、亲民、务实之风，无不凸显出“改进作风”这一宏大主题。从这种意义上讲，规定领导亲自阅批群众来信，确是改进作风主旋律之下的乐章之一。

（摘自《光明日报》）

如何让孩子“高高兴兴上学”

董　璐

“无精打采，嗜睡无力，两眼无神，内心焦虑，时常走神，对事物没兴趣耐心，每学期总有那么几天，十几年来出现周期相当规律……”网友“荣乐乐乐了乐了”在微博上如此描述自己遭遇十年有余的“开学恐惧症”。

随着各地学校春季学期的陆续开学，不少网友感慨自己仿佛患上了开学恐惧症，不论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包括幼儿园的孩子们，甚至不少学生家长都难以幸免。调查称不少孩子在开学初期会产生极为强烈的厌学情绪，也有部分家长表示，孩子一想到开学就情绪低落。短暂的寒假，大批量的书面作业和“老师要求”的“软作业”，让不少孩子和家长们叫苦不迭。

今年六岁半的小表妹上小学一年级就遭遇了“作业大军”，寒假就“被”要求抄写上学期所学的100个一类生字、400个二类生字，背诵一个本200多页的儿歌，还要读两本书，制作两份小报。这仅仅是冰山一角的“语文大军”。数学老师还要求每天做50道口算题；英文老师要求每天认读单词、看原版的英文动画片……

六岁，正是爱玩爱动的年龄，若要圆满完成老师的要求，孩子们必须每天都困在家里“马不停蹄”做作业，还如何尽情玩耍和锻炼身体？小表妹每次提到作业总是一脸苦相，说到开学更是“烦得很”。

为何孩子们会如此害怕开学？也许是习惯了懒散随意的假期生活无法适应学校的约束，可堆积如山的作业又让孩子们的寒假谈何轻松？更遑论近日频现报端的“第三学期”了。作业、补课、辅导班，早已让孩子们瘦弱的肩膀不堪重负。

请减轻下孩子们肩头的重负，还他们一个轻松的假期和学校生活，让校园成为孩子快乐成长的乐土，让孩子“高高兴兴上学堂”。(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面子与器识

罗智刚

据媒体报道，江苏高淳县商务局副局长魏某乘坐公车为奥迪A6L，售价60多万元，严重超标。魏某向记者坦言，车系公款购买，因自己去外地开会弄辆破车形象不好，乘奥迪有面子。

十八大以来，清明、清廉、务实、为民之风日益彰显，但总有一些人顶风作案、肆意妄为。魏某乘坐售价60多万元的奥迪A6L公车，且“坦率”地称“有面子”，是典型的“不识时务”、助长歪风邪气。

殊不知，魏某有了奥迪“面子”，却丢失了作为领导干部最起码的“器识”。

何谓“器识”？就是器量与见识。全国各地绝大部分领导都乘坐普通公车，而魏某却要乘坐60多万元的奥迪，可见其没有“器量”；勤俭兴邦、奢侈亡国是千古良训，中央“八项规定”和习总书记重要批示都要求勤俭节约，而魏某置若罔闻，可见其毫无“见识”。如此既无器量、又无见识的人，试问如何能成为好的领导干部？

器识决定成败。面子思想在国人心中根深蒂固、积淀甚深，但虚伪的、空洞的面子害人、害己、害国家，应当坚决抛弃。成大事者胸襟要宽、眼光要远、礼贤下士、虚怀若谷，这是所有领导干部都必须追求和做到的。领导者当有良好的内在修为，以严格遵守法纪为荣，以奢靡淫欲为耻，在平时的工作、生活、学习中，不讲排场讲实在，不讲面子讲里子，不讲条件讲落实。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对过去已经发生了的事依法依规惩处的同时，更要考虑以后怎么办。笔者认为至少可以做好以下三点：第一，领导干部要带头倡廉戒奢，各级政府官员是社会风气的导航仪，应率先垂范、从我做起、表里如一，才能使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第二，要坚持不懈地加强思想教育，“物腐始于心魔”，思想堕落是起源，应加大教育宣传引导的力度，发挥群众和社会监督功效，形成强大的舆论态势；第三，要加强制度和法制建设，将提倡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纳入法制建设范畴，配套建立惩戒的规章制度，并严格执行，让那些胆敢贪墨的蛀虫望而生畏。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排场、面子事小，器识、兴旺事大，孰轻孰重不言而喻。(摘自《光明日报》)

人口红利拐点

连建明

国家统计局上周五公布了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其中有个很值得关注的数据，那就是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下降，市场讨论很久的人口红利拐点已经出现。

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15—59岁(含不满60周岁)劳动年龄人口93727万人，比上年末减少345万人，占总人口的69.2%，比上年末下降0.60个百分点；60周岁及以上人口19390万人，占总人口的14.3%，比上年末提高0.59个百分点。劳动年龄人口在多年增长后首次出现下降，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拐点已在2012年出现。

这两组数据显示，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首次出现下降，另一方面，老年人口比例进一步上升，人口老龄化矛盾日益突出，我国已经出现“未富先老”的缺口。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表示，我国储蓄率目前还处于上升阶段，一旦人口结构和储蓄率都跨过拐点，则我国过去几十年的宏观经济环境将发生改变。其他国家经验显示，人口红利消失伴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和工资增长放缓，甚至通缩的压力。

对于经济学家关心的人口红利问题，百姓其实也有直观的感受，典型的就是招工难，像饭店服务员这种普通工作，招人越来越难。而且越来越多行业出现招工难，像武汉，公交车司机年缺口2800人，尽管年龄放宽，月薪升到四五千元仍招不到人。

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的趋势还将延续，尽管未来10年，劳动年龄人口还将稳定在9亿人左右，短期影响有限，但长期影响必然会逐渐体现，对此值得关注。因为无论生活工作，还是投资理财，只有站在未来考虑现在，才能适应将来格局的变化。比如，现在许多人觉得投资房产未来收益一定很好，但是，10年、20年后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一些家庭的房产也许会多出来，不再成为一个紧俏商品。再比如，现在很多人希望找个坐办公室的工作，而西方国家流水线工人、建筑工人的工资并不低于坐办公室的白领，随着人口结构变化，也许以后我们这里同样如此，因此，选择未来职业不必挤在一股道上。

（摘自《新民晚报》）

让违规出租车示众不妥

李方向

载客不打表、客流高峰时拼客、拒载……管理部门接到这样的投诉后，会对出租车司机进行现金处罚或要求车主停车学习，有时会进行口头教育。近日，两辆的士因“不打表”和“违规拼客”被运管处按上限分别处以罚款500元、停运学习7天的处罚外，并在宜昌东站的士停靠点“示众”，接受另类处罚。(2月21日《三峡晚报》)

无独有偶，近日武汉市对查扣拒载、拉客和议价的违规出租车除了进行严厉处罚外，还将违规出租车的车牌号向社会公布。有关部门依法对违规出租车进行严厉处罚，这无可非议，也是违规者必须付出的应有代价。否则，违规出租车就会泛滥成灾，乘客的权益就不会得到保障。

可是对违规出租车按章作出司机停车学习、罚款、停运处罚后，还要对违规出租车进行公开示众，着实不妥！因为所有法律法规都没有允许有关部门可以对违规出租进行示众的条文。打击违规出租车的本身没有错，但不能超越法律界限。在法治社会“公民，法无禁止即可行；对公权，法无授权不得行。”显然有关部门让违规出租车示众是违法行为。违规出租车当然需要打击，即使初衷再好也不能凌驾法律法规之上，因为不仅乘客的权利需要保障，出租车司机和车主的权利同样也需要保障。

将违规出租车示众，无疑将这辆出租车贴上了一个“坏车”的标签，乘客恐怕宁愿不乘车也不会选择这样的出租车乘坐！给出租车带来的损失会远远超过司机停车学习、罚款、停运带来的损失！现在随着法制的进步，犯罪嫌疑人都不再进行游街示众，即使需要出现在公共场合，有关单位不光会为犯罪嫌疑人戴上头套，有时连手铐也会进行掩盖。目的就是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违规出租车示众着实可以带来威慑力，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出租车违规，从而减少工作人员的工作量，但是这必须叫停！因为这不仅无法可依，也是一种倒退；这不仅是权力在耍把戏，也会异化为权力寻租的手段！

（摘自《北京晨报》）

杜绝“到此一游”还要靠法规约束

何　勇

“今日，一名叫梁齐齐的游客，在故宫大铜缸上刻下了到此一游，逮到你都得剁你的手”。几天前，故宫工作人员颜先生巡视时发现太和门附近的一口大铜缸被人偷偷刻上一行字，气愤之下将此事发上微博。

游客在旅游风景区或文物古迹上留下“墨宝”并不少见。2010年，故宫保和殿离地近30米高的正中匾额右下角处就被发现“到此一游”字迹。

长期以来，“到此一游”被认为是涂鸦者的个人素质问题，是一种不文明行为。所以，提出的对策往往是道德谴责，通过社会呼吁和道德约束来遏制“到此一游”。但是，“到此一游”并没有在旅游景区绝迹，相反不时被揭露和报道出来。毕竟，道德约束成本太低。

游客涂鸦“到此一游”等字样，不只影响美观，加大了景区清理负担和成本，对于自然风光、公共财物，甚至文物古迹来说更是一种严重的伤害。“到此一游”涂鸦是一种经济伤害、文物伤害，而不是简单的文明陋习。

因此，要杜绝“到此一游”，不能光指望道德自律，而是要依靠法规规范和约束游客的行为，加强对“到此一游”等行为的惩处力度，轻者要求涂鸦者清洗掉自己的“墨宝”，并给予一定的罚款，重者给予治安处罚，提高“到此一游”的成本。　（摘自《新民晚报》）

弃富逐贫

刘楚汉　王乃玲

2013年1月21日，大同县扶贫办主任拿到了山西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文件，文件明确，大同县享受“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同样待遇。这意味着，在成为“小康县”16年后，大同县开始享受“贫困”待遇，获此称号后该县已得到千万元资金资助。

客观地说，充分利用和创造各种条件为地方谋福利，本身并没有错，而且还应该是执政为民的应有之责。戴上贫困县帽子，各项政策、资金、项目就会滚滚而来，这是个公开的秘密。同样，挂上了小康县头衔，在招商引资、项目引进的时候也会受到格外青睐。问题在于，“小康”和“贫困”是近乎两个极端状态，毫无交集，岂能说变就变？

查看“小康”和“贫困”的设定标准，指向并不一致，但对一个地方而言，“贫困”和“小康”绝不会兼而得之。

知情人士道出了其中的奥秘。当年大同申请小康县时，有些标准并不符合，但“统计数据都迎合了小康”。与之相对应，隔壁的阳高县的书记“坚决没有要”，也就没有成为小康县。可见，“贫困”或者“小康”，不是首先取决于实际经济状况，而更多缘于地方领导“要或不要”。为了利益追求，统计数字可以随意提高或降低以“迎合”需要。出现“贫困”与“小康”间的随意转换，也就不奇怪了。“小康县”变身“贫困县”，不过是统计水分太大的又一个生动注脚。

关乎民生的收入状况成为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很像一幕闹剧。但可笑的并不该只是当地政府及领导。利益冲动总是会有，但各种制度标准应是阻止冲动的根本。而这其中，数据的客观准确应是个基础工作。维护统计的严肃性，必须得到重视。(摘自《西安晚报》)

校训要有个性，更要逐字落实

郭文婧

近日，一项针对国内256所大学的调查显示，有192所学校的校训都是“四词八字”的口号式，还有个别大学校训甚至完全相同，高校校训同质化、标语化现象严重。调查还显示，六成大学生对校训“不感冒”，甚至有在校老师工作七年竟不知校训。(见2月24日《武汉晨报》)

校训，《辞海》的解释是这样的：“学校为训育上之便利，选若干德目制成匾额，悬之校中公见之地，是校训，其目的在使个人随时注意而实践之。”校训，本应是一所学校之魂，规定着办学方向和人才培养规格。校训像一面镜子，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学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程度。

学生为什么会觉得校训是摆设，不感兴趣呢？现实中，不可否认的是，“博学”、“厚德”、“创新”、“载物”之下，一些为师者的言行与此却有不小的距离。在办学者和育人者身上，尚且很难体现出校训的精神追求和坚定信仰，又怎能强求学生去亲身践行？一些校训存在的形式主义的“假、大、空”，校训“摆设化”现象严重。

放眼看国外大学校训的来源，无外乎是两种，一是奠基人的举办目的。拿破仑“为了打仗而受训”创办了圣西尔军校，康奈尔为了“让任何人都能在这里学到想学的科目”创办了康奈尔大学；二是以杰出校友为标杆，选其名言以励志。柏林大学的校训来自马克思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斯坦福大学的校训来自首任校长大卫·斯塔尔·约旦的“让自由之风吹拂”……可以说，西方每所大学的校训，都有一段精彩的故事。因为故事精彩，所以校训有力。

而我国大学校训的来历，就有点“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感觉，为了“标配”而生憋出一个校训。“寻章摘句老雕虫”，到古老的经典里去找；“逢迎领导、投其所好”，一个人的题词就变成了一所大学的校训；“征文启事”，由领导凭其偏好打钩。这样的校训，看似句式工整、形式优美、词义明快、朗朗上口，然而缺乏历史的厚重，缺乏情感的亲切，缺乏故事的精彩，缺乏榜样的激励，从而也就缺乏刻骨的铭心和长久的印象。

如今，很多高校纷纷制定《大学章程》，追求特色办学、自主办学，与此同时，众高校不妨深入挖掘一下自身的办学传统和文化内涵，深入思考一下学校的当下之要和未来之本，明晰自己的办学定位，重新确立一个具有广泛认同感的校训。

当然，并非所有高校都一定要抛弃已有校训。相反，围绕已有校训开展持久相关的文化建设，用实际行动一点一点去落实好即使只是“八字四词两句”中的任何一个字、一个词，都很了不起，都可以将校训内化为师生的为人为学品格，展现一所大学的精神追求。(摘自《工人日报》)